

明清以降“南樟北祁”药市之比较

王中良,杨小敏

(中国地质大学 长城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中国古代药市,自唐宋时期初步发展至明清时期日益繁盛,是传统中药材交流与贸易必不可少的市场载体。明清以后,全国陆续出现许多颇具影响的地方药市,其中“南樟北祁”(江西樟树药市、河北祁州药市)作为地区甚至全国性药材交易的典型代表影响甚大,一直颇受各界关注。两个药市的发展之路,有相同之处,亦有各自特色。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应对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型变化时,“南樟北祁”结合各自实际作出了适时适当的抉择与变化,实现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发展与整合。

关键词:“南樟北祁”;明清时期;药市;药材交易;传统经济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4-0124-05

中国古代药市大都源自于寺庙定期庙会活动与药材交易的紧密结合。依据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记载,最早的定期药市出现于中唐时期的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后发展为更大规模的成都药市^[1]。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与交流,这种定期药市的形式逐步推向全国,至清末民初达到鼎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中心,如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市)、百泉(今河南省辉县百泉镇)、樟树(今江西省樟树市)三大药市,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这三大药市,都是在明代经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倡后迅速发展参与到药商更广的新阶段,之后百泉被称为“中原药都”,祁州发展为“北方药都”,樟树发展为“南方药都”^[2]。在明末清初之时,“南樟北祁”的说法既已称盛,樟树与祁州作为南北两个专门从事传统中药材贸易的全国性市场代表,相比较而言,既有时代发展的共性,也有各自市场的个性,值得我们关注与分析。

“南樟北祁”两个药市,基本都是发展于明清之际,至清末民初达到繁盛。在共同的时代环境的影响下,两药材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两者的自然地理条件均比较适宜发展传统中药材种植业,并具有影响较大的道地药材。樟树位于江西中部,以湖泽平原为主,平原、丘陵、山地、盆地相间,地质地貌多样,适宜草质花叶类和草本根茎类及水生药草成长。同治九年(1870)《清江县志》记载,樟树“药之属,有吴茱萸、白药、婴粟、百部、半夏、天南星、元参、苦参、天门冬、麦门冬、五加皮、香附子、乌药、茯苓、紫苏、五倍子、何首乌”等25个品种^[3]。根据当代药材资源普查,樟树本地所产药材计有200多种,其中特产药材有积壳、积实、陈皮、江桅子等。比较类似,祁州地势平坦,由于历史上水患频仍,以洪积横积平原为主,大多为沙土地,虽禾稼不易滋长,却适宜耐旱的草本植物。据《祁州志》记载,宋代此地已种植药材近30种。明至清乾隆二十年(1755),其药材增加到近50种,有枸杞、紫苏、芫麦、紫花地丁、薄荷、荆芥、薏苡等。药市发

收稿日期:2014-06-23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祁州药市金融体系的市场考察”(201303396)

作者简介:王中良(1980-),男,河北赵县人,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

展至雍正以后,逐渐步入盛期,药材品种增至70余种,其中质地优良,堪称正宗的品种,被医药界冠以“祁”字,如:祁菊花、祁大黄、祁白芷、祁艾等,均以祁州产地最富药效^[4]。

其次,两者的药市文化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与时俱进,巩固并扩大了药市的基础和地区影响。“南樟北祁”之所以能够发展为南北“药都”,不仅与其区位、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也与其各自的人文社会环境联系紧密。从药王庙的神祇变化的角度来看,对樟树药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葛洪和孙思邈,而对祁州药业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却是曾经的汉将邳彤。在樟树,道教与医药的发展相得益彰。阁皂山相传是三国时葛玄采药炼丹之地,成为道教灵宝派发源地,葛玄由此被樟树药界奉为鼻祖。葛玄侄孙葛洪深入樟树民间,总结群众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收集、整理民间验方,著为《肘后备急方》^[5]。此书被历代樟树药界奉为经典,视为必读书籍。之后孙思邈相传也到过阁皂山,并亲自采集、种植和炮制药物,他在樟树采药行医留下的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后来孙思邈成为樟树药业神祇中最主要的药王,且被建药王庙供奉,每年孙思邈诞辰起,药界中人齐集药王庙,举行为期半月的交易大会,称为药王会,实为大型药材交易市场。而在祁州,宋代有关皮场王的信仰尤盛,民众迷信皮场王的神力,明成化年间至清嘉庆九年(1804),庙中主神皆为皮场王,药王庙亦被称为“皮王神阁”。而现药王庙之称在起初并不存在,碑记中出现的则是皮王阁或皮场祠。至于祁州“药王”的称呼,最早见于清初乾隆年间的方志,《祁州志》卷三《建置志》载:“汉将邳彤之庙,俗呼为皮场王,即药王也,在南关……自宋迄今,以医显灵,有疾者祷之立愈。”在此志中,已经将邳彤、药王、皮王糅合成一体^[6]。可见邳彤作为汉将,以其关心百姓疾苦,在民间倡导和扶植医药行业而被当地民众感怀,被人们依其原形创造出所谓“药王邳彤”。与樟树供奉的真正药王孙思邈不同,祁州“药王邳彤”可以说是当地民众为了提高祁州药市的神灵色彩而附会的。虽然“南樟北祁”供奉神祇不同,但性质却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经济发展中,基层乡村药材市场的深入发展确实需要最大限度地符合民众崇尚神明的人文习惯。因此,在南北药市对药王庙进行传承维护与发展的背后,值得关注的是当地逐步活跃起来的药材贸易与商帮的需求。

最后,两者的药商集体势力的成长为“南樟北祁”的全国性影响添加了最具活力的人为因素,比如代表樟树药业发展的利益集团称为“樟树帮”,代表祁州药业发展的利益集团称为“祁州帮”。明清以后是中国各药帮队伍日益壮大的关键时期,逐步形成以地缘、业缘为纽带,对上应付官府、代收捐税、筹集物资;对外排斥其他药业组织或个体药商;对内协议药价、调剂货源、组织活动、解决纷争等维护本集团利益的比较松散的药商组织。在樟树长期的药业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樟树药材商人为主的樟树药帮(起初仅限于清江人,后扩大到临江府属各县的从业人员),他们的足迹遍及南方数省甚至全国,有力地扩大了樟树药业的影响。在清代最盛时,樟树行号铺店计有200余家,每家一般有店员6~20人,分前柜、后柜,前柜售卖,后柜加工,自制中药饮片,批发零售兼营,并代客买卖。药行开业本金可大可小,生意较为稳定,有的药材行世代经营达几百年之久,如大源行、庆隆行、福泰行、金义生行等直到民国后期仍在开业。清后期发展起来的药号,其规模超过了药材行,著名的药号有乾元隆、金太降、茂记、德记、长记、阜兴、庆仁等,其中茂记的从业人员达到六七十人之多,年批发金额在50万银元^[7]。比较类似的发展之路,在祁州,清代当地药商组成药庄及药号大小多达800余家,所售大部都是廉价的药材,有时从各帮号转购药材。起初当地影响较大的药号有三槐堂、瑞生堂、许源长药庄(伟迪氏制药厂)等,后来崔家与卜家在祁州并称“崔卜两大户”,多年担任安客堂(商会)主管,善解各地药商纠纷,声誉极高,所营商号有永德裕、永和堂、熙椿堂、全记、瑞盛永、德兴永、德兴南等。卜家商号除做批零业务外,专做黄芪出口生意兼营人参,多年居于黄芪帮领袖地位,其黄芪加工产品后来广销东南亚,且在东北大宗收购人参,动辄几千包。崔家字号常到各药材产地收购药材,如连翘、小茴香、防风、柴胡等,数量很大,有时动辄几十万元^[8]。

以上三点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传统药市初步发展阶段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造就了“南樟北祁”的基础和雏形。不过此后的深度发展,两个药市则展现出更多的各自特点。

二

我们大抵可以从地缘条件的发展前景、药市金融的发展规模、药市管理机构的职能责任以及近代化转型的压力四个方面进行比较。

第一,从地缘条件的发展前景来看,樟树比祁州拥有更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樟树药商利于“走出去”,祁州药商则善于“引进来”。

江西樟树素有“四会要冲、八省通衢”之称,樟树既是区域性的水陆交通枢纽,又是当时全国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之一——赣江大庾岭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樟树地处鄱阳湖平原南缘,明中期以后处于赣江与袁河交汇处,在传统社会水陆交通中的区位优势相当明显。特别是清乾隆皇帝下令开广州一口通商,赣江水道遂成为联系中原地区与南乡数省乃至海外的重要贸易渠道,依傍赣江的樟树镇因而获得了大发展的有利条件,成为因工成镇的典型代表,近代“江西四镇”之一(与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并享盛誉)。樟树药商(樟帮)不仅具有清代同时期商人的共性,更以其进货渠道广阔,活跃于大江南北著称。“(清江)俗多商贾(或曰民勉贸迁,竞相沿成俗),或弃妻子徒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关、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9]。樟帮以其人多地广的优势和精湛的加工炮制技艺,西与川帮争雄,北与京帮抗衡,与京帮、川帮并列齐名达数百年之久,成为全国三大药帮之一。相比较,直隶作为明清以后的京畿重地,吸引全国商人汇聚于此。祁州则位于华北平原腹地,曾是南北交通必经之地,明清以后距离当时发达的经济中心定州、保定、天津都较近,虽有水陆辗转,却可利用沙河六七月间发水时,将祁药下运至天津,而关东帮及山陕帮等之药材亦可经天津运至祁州。祁州以其汇通之地,后聚集了全国各大药帮,称为“十三帮”^[10]。道光九年(1829),各地药商集资在祁州药王庙前铸两根铁杆底座的捐资名单,正式出现“帮”的称呼。活跃在祁州药市的主要有13个药帮,简称“十三帮”,大体为:京通卫帮、关东帮、古北口帮、西北口帮、山东帮、山西帮、江西帮、陕西帮、彰武帮、宁波帮、怀帮、亳州帮、川帮。其中江西帮,即樟树帮也长途跋涉,足至祁州。

第二,从药市金融的发展规模来看,祁州比樟树的金融资本更为庞大,金融组织与手段更为完善。

在祁州,银钱号会是当地“五大帮”^[11]之一,专门从事货币兑换、存款划拨等业务。入驻祁州药市的银号最早的、势力最大的均为山西人经营。祁州药市出现的最早的银号即乾隆年间由山西人开设的“兴盛”银号。药市累计发展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钱业经营者19家,大小银号平均资本20万元,年营业额60万元,至民国时期祁州药市各银号资本总额基本达200万元,经营者主要是山西省的太谷、榆次人^{[12][16]}。祁州药市金融方式中的“拨银子”(拨兑之法),是晋商的金融创制,乾嘉时期在归化城筹建宝丰社时有实践^[13]。祁州药市“十三帮”之中即有山西帮,晋商在祁州进行药材贸易时也把这种拨兑之法带到了祁州,结合当地需求,各大银号均有此业务。就整体地区而言,保定虽曾是清代的直隶省会,然极盛一时,清末直隶省会迁往天津,保定商业、金融业大受影响,据民国十五年(1926)刊物记载,保定有银号大小20余家,资本大者四五万元,小者三五千元不等。不过与高阳“布纱交易虽大,而无一金融机关”^[14]相比,当时祁州银号大者有11家,小者几十余家^{[12][26]},银号数量占据保定一大半,是河北金融业的典型代表。相比较而言,在樟树,咸丰五年(1855)清江县商人喻达和、宋萃善在樟树开设当铺,成为宜春地区最早的当铺。同治十一年(1872)清江县致仕官员吕世田、关耀南、朱孙治、黄杰等组织创办宾兴典。光绪二十九年(1903)江西官银钱总号在樟树设立了分号和兑解所。此后,当铺、钱庄陆续兴起。到民国时,清江县有当铺24家、钱庄21家。民国二十二年(1933),清江县当铺、钱庄放款130万银元,这是樟树典当、钱庄业的兴盛期^[15]。可见江西商人更重视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樟树钱业资本总额及金融机构、业务等资源的开发较之祁州稍为逊色。而直隶商人更重视地域协作,如祁州吸引晋商入驻,后来“祁州帮”对天津商会产生了积极影响等等。在金融资源方面,祁州比樟树具有更为集中有效的金融条件,发展较为完善。

第三,从药市管理机构的职能责任来看,祁州安客堂比樟树商会协调能力更强、社会影响更为深远。

祁州药市最主要的管理机构当是清代道光年间,由地方士绅组织成立的安客堂^[167](1910年更名为商务分会),由祁州富绅大贾与药商协商成立,虽属于民间组织,但它在对外联络药商,对内维护药市经营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祁州安客堂的领导职务主要是由当地资望兼备的大药庄负责人担任,如祁州崔、卜两大户本身经营大药材庄,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和官府、“十三帮”亦有联系,因此长期掌握安客堂实权。安客堂不仅成为祁州药市得以正常运转的有力保障,后来还分担了本属于官府的稳定地方经济秩序的责任,比如更名后的商会在一定时期内自行发行私票^[16],以满足药材交易对流通货币的需求。并且安客堂善于管理药市经纪人(当地俗称药行经手人),要求唯有当地人可以担任,由安客堂(商会)统一注册管理。这些经纪人大多游走于帮商与药店之间,以自身信用担保促成双方交易,抽佣交易额近4%留用。他们依靠自身信用可以在资金未到时就提前促成交易,事后再补拨款,地位十分关键。安客堂(商会)和经纪人,作为祁州药市金融稳定的主观要素,以绝对信用保障着自身及市场利益的延续。樟树则于1904年清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之后才正式成立“江西清江县樟镇商务分会”^[17],樟树商会不同于专门负责药市稳定的祁州安客堂,是负责樟树所有行业的市场管理机构。只是鉴于樟树药业的庞大,药商团体在樟树商会的影响力最为显著,曾经无科举功名的药商“如春号”的职员邹赋阁才得以成为樟树商会的二号人物,任“坐办”。显然与祁州安客堂主要来源于当地富绅大贾不同,樟树商会首脑人物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曾担任樟树商会总理的钱董会帮首领陈世楠是四品衔花翎前安徽泾县、潜山知县,担任商会议董的绸缎帮首领罗承奎是蓝翎州同衔,等等^[18]。

第四,从面对近代化转型的压力方面来看,“南樟北祁”历史性地选择了各自的转型道路。不过与近百年来中国过渡性社会的总趋势基本一致,出现了式微之势。

在药市经济的转型中,樟树药市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面对封建政权和外来侵略势力对江西原材料的掠夺和对当地商帮的冲击。随着赣江大庾岭黄金通道的衰落,曾经具有区位优势樟树反而变成了相对闭塞的交通死角。原本善于“走出去”的樟树药商,转而回归樟树,以樟树医药之人文基础,深入发展道地药材的种植与开发,实现了樟树药业在新时期的拓展,逐步完成了近现代樟树中药材专业市场的建设。相比较,祁州药市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内政治动荡、军阀掠夺等因素带给它的不得不进行区域整合的压力。民国五年(1916)曹锟督直,计划将祁州药市(安国药市^①)迁至保定,因遭到当地药商反对,曹锟怒致一度禁止安国开庙。事后无奈,曹锟转而要求在当地设立牙纪局,按交易额2%为佣金归局征收。此后祁州(安国)各街口都设关卡,常开药包检验,造成仅隔桑皮纸一层的各药种类时有混淆,贻误时日。许多药商畏此苛繁,大多不再足至祁州(安国)^{[12][184]}。不过,祁州药市为了突破旧有体制的限制,当地药商及商会以其曾经较为完善的金融资源为内生力量,逐步向外拓展,实现了药市资金及影响的转移和分化。这对后来天津商会力量的壮大,北方中药材的对外出口贸易以及石家庄药业的崛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作为全国性的药材交易市场代表,“南樟北祁”发展繁盛于明清以后,两者在自然条件、人文基础和药商势力等专业市场形成的基础要素方面具有共同之处。随着药市经济的深入发展,结合不同的地域实际,两者具有了各自的发展道路,如樟树比祁州拥有更便利的传统交通区位条件,樟树药商走南闯北,使得“樟树帮”成为全国三大药帮之一。然而在“走出去”的同时,樟树药商自身金融资本的运作与管理却不够完善,面对外来洋行的近代冲击,樟树药商资金掣肘,难有对应之策,只得改变外向型发展方向,深入道地药材的种植与开发。相比较,祁州比樟树吸引的金融资本额庞大,金融组织与手段更为完善。而且祁州药商善于地域协作,全国药商(“十三帮”)辐辏于此,其中善于金融创制的晋商更是

^①民国二年(1913),中央令改祁州为祁县,因与山西省重复,次年(1914)改称安国县。

长年入驻,直接促进了当地药市融资水平的发展与进步。在祁州安客堂(商会)的有效协调管理下,当地药市经济的近代转型之路显得更为灵活,最终实现了药商和药业资金的区域间转移与分化。这不仅在主观上延续了“祁州帮”的资金血脉,推动了北方地区经济重新洗牌,在客观上也有利于近代京津冀的地域经济分工与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唐廷猷.中国古代的药市与当代的药交会[J].中国药学杂志,1997(3):49-52.
- [3] 潘 懿.清江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4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 [4] 赵燏黄.祁州药志[M].樊菊芬,点校.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 [5] 张大钊.中医文化对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20.
- [6] 徐天基.地方神祇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J].民俗研究,2011(3):156-180.
- [7] 萧 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1):65-70.
- [8] 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国县志[G].安国: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
- [9] 秦 鏞.清江县志[O].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刊刻本.
- [10] 周 汶,徐国成.古今药都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131-132.
- [11] 安庆昌.安国文史资料·安客堂和十三帮五大大会[G].安国:政协安国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72-73.
- [12] 郑合成.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安国县药市调查[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 [13] 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 [14] 龚 关.近代天津金融业研究(1861—1936)[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33-134.
- [15] 丁国良,辛才云.宜春地区金融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 [16] 戴建兵.近代河北私票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34-38.
- [17] 朱 英.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协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
- [18] 周榜师.传统产业与地域社会——以明清以来江南药都樟树为中心[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

Comparison of Medicinal Material Markets in “South Zhang and North Qi”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Zhongliang, Yang Xiaomin

(Great Wall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medicinal material market,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flourish. They play an essential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exchanges and trade market.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national have many influential local medicinal material markets, the “South Zhang and North Qi” (Jiangxi Zhangshu, Hebei Qizhou) as a regional and even national medicine market representative, has been praised b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Comparison of “South Zhang and North Qi” medicinal material market, both have in common, also hav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o deal with traditional economy to modern economic transition change, “South Zhang and North Qi” combining the reality of their medicinal material markets made timely appropriate choice and change, implements in the new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 “South Zhang and North Qi”; Ming and Qing Dynasty; medicinal material market; medicinal material transaction; traditional economy

(责任编辑 张春生)